臺大佛學研究．第四十四期
民 111 年 12 月，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頁 67-104
DOI: 10.6727/TJBS.202212_(44).0003

數位人文分析的探索性遠眺
——以宋、元、明《楞嚴經》的註釋傳統為例

楊志常*、洪振洲**、周邦信***

摘　要

本研究計劃選擇了漢文佛教傳統中，深具影響力的本土經典《楞嚴經》，擬考察巨觀的《楞嚴經》註釋傳統的格局面貌。研究範疇主要分成兩個部份：一、《楞嚴經》註釋傳統組，涵蓋了宋、元、明三代，三十九部、三百一十二卷的《楞嚴經》註釋書；二、《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可能引用的「組外引用來源」，總共六百七十部、五千二百七十七卷。

面對如此大量的《楞嚴經》註釋書與相關典藏，以往的研究者通常只能選擇性地聚焦於少數幾部註釋書作研究。如此研究方法的可能缺憾是「不識廬山真面目」，不得見一個比較巨觀的《楞嚴經》註釋傳統全貌格局。為了彌補這個「見樹不見林」的可能缺憾，本研究企圖利用數位人文的量化分析方法——大量文本間的「文本重用」分析，對於這個以往難得一見的巨觀格局，作一個探索性的遠眺。

關鍵詞：《楞嚴經》、註釋傳統、文本重用、數位人文

2022.08.09 收稿，2022.12.30 通過刊登。
* 作者係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
** 作者係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教授，兼任圖書資訊館館長。
*** 作者係法鼓文理學院數位典藏組工程師。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當佛教的大乘運動在印度開始之際，佛教上座部，以大乘教義並非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所教說為由，視大乘經典為杜撰的經典。由於原始佛教教義與當時新興的大乘教義之間有差異和衝突，為了提供大乘教義的正當性，大乘經典的作者以及其跟隨者，不得不發展出大乘相關的神話，以及理論如三身論等。於是，單一的佛陀演變成十方的諸佛；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也僅是三身中的一個變化身而已。大乘佛教，作為一個「累積的傳統」[1]，便以如此的方式，在印度不斷變化的歷史脈絡中，不停地與時俱進，直到它幾乎完全在它原來的發源地消失，或者被印度教所吸納為止。

問題是：當印度的佛教經典傳譯成為漢文的佛教經典之後，大乘佛教，作為一個累積的傳統，又是如何在東亞不斷變化的歷史脈絡中與時俱進呢？Tokuno 的漢文佛教經錄的「本土經典」（indigenous scriptures）研究似乎可以提供一些好的線索。[2] 根據來自於 Tokuno 研究的靈感，筆者猜想，佛教傳統為了維持它在東亞作為一個活傳統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本土經典的製作，以及其註釋傳統的建立。如果筆者的猜想可以成立的話，則本土經典以及其相關註釋的研究，就成為了解東亞佛教傳統發展，一個

---

1 "...'The cumulative tradition' as a concept, therefore, is not inflexible or final, either in content or in form. It is not given by the world, but is a human construct offered to order what is given...." See Wilfred Cantwell Smith, *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8), 168-169.

2 Kyoko Tokuno, "The Evaluation of Indigenous Scriptures in Chinese Buddhist 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s Glossary of Chinese Terms," in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ed. Robert E. Buswell J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31-74. 也可以參考于君方，〈「偽經」與觀音信仰〉，《中華佛學學報》第 8 期（1995 年 7 月），頁 10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關重要的切入點。所以，本研究計劃選擇了漢文佛教傳統中，深具影響力之一的本土經典——《楞嚴經》，擬考察《楞嚴經》註釋傳統建構的面貌。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以下簡稱《楞嚴經》）[3] 首先見於唐朝智昇（668-740）所撰漢文佛教經錄《開元釋教錄》[4] 與《續古今譯經圖紀》[5] 中。根據智昇的記載，《楞嚴經》的翻譯是由般剌蜜帝為譯主誦出，彌迦釋迦為譯語，房融作筆受，以及懷迪作證譯，在唐神龍元年（705 AD）譯成。接著，從宋朝的《開寶藏》到清朝的《乾隆大藏經》，《楞嚴經》就一直收列於漢文大藏經中。[6] 雖然如此，自從《楞嚴經》流通以來，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一直有人懷疑《楞嚴經》為疑經或者是偽經。[7]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懷疑不僅同時來自於佛教界與非佛教界，也同樣出現在中國、日本和韓國，也從唐朝以來跨時地發生到現代。有些現代學者甚至斷定，《楞嚴經》就是中國本土所產出的經典。[8]

---

3 唐．般剌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CBETA, T19, no. 945。

4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 9，CBETA T55, no. 2154, p. 571, c14-26。

5 唐．智升，《續古今譯經圖紀》，CBETA T55, no. 2152, p. 371, c24-p.372, a6。

6 楊維中，〈論《楞嚴經》的真偽之爭及其佛學思想〉，《宗教學研究》2001 年第 1 期，頁 59。

7 疑經或者是偽經的分別，可參考 Tokuno, “The Evaluation of Indigenous Scriptures in Chinese Buddhist 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s Glossary of Chinese Terms,” 41-42.

8 夏志前，〈《楞嚴經》之譯解與聖典化問題〉，《學術研究》2014 年第 11 期，頁 23-26。楊維中，〈論《楞嚴經》的真偽之爭及其佛學思想〉，頁 61。韓鐘萬，〈《楞嚴經》在韓、中、日三國的流傳及歧見〉，《佛學研究》1994 年第 3 期。呂澂，〈楞嚴百偽〉，收入李安編，《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山東：齊魯書社，1996 年）。James A Benn, “Another Look at the Pseudo-*Śūraṃgama Sūt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 no. 1 (2008), 57.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儘管如此，就《楞嚴經》在漢傳佛教傳統中廣受喜愛的程度，以及倍受重視的事實而言，《楞嚴經》是否為中國本土的經典，似乎就顯得無關緊要了。根據錢謙益（1582-1664）的《楞嚴經疏解蒙鈔》[9] 和通理（1701-1782）的《楞嚴經指掌疏懸示》[10]，從唐朝到清朝，至少有六十九家的《楞嚴經》註釋家。其中，唐朝有四家，宋朝有二十家，元朝有四家，明朝有三十四家，清朝有七家。[11] 就《楞嚴經》註釋家的數量而言，明朝最多，大概佔 50%，而宋朝第二，幾乎佔 30%。就註釋家的構成成份而言，《楞嚴經》註釋家不僅涵蓋了來自不同佛教宗派的學問僧人，如華嚴宗、天台宗與禪宗等，也包括了儒家的宰官與文士，甚至於道教的道士。[12]《楞嚴經》的影響之大，可從以下呂澂的負面批評與智旭的正面讚頌略見一斑。

> 至於《楞嚴》一經，集偽說之大成，蓋以文辭纖巧，釋義模棱，與此土民性喜驚虛浮者適合，故其流行尤遍。賢家據以解緣起，台家引以說止觀，禪者援以證頓超，密宗又

---

9 明．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CBETA, X13, no. 287, p. 503, b21-p. 506, a20。

10 清．通理，《楞嚴經指掌疏懸示》，CBETA, X16, no. 307, p9, b02-p. 11, a14。

11 通理提到六十八家，但是不包括他自已。清．通理，《楞嚴經指掌疏懸示》，CBETA X16, no. 307, p. 9, b2-p. 11, a14.

12 夏志前，〈《楞嚴》之諍與晚明佛教——以《楞嚴經》的詮釋為中心〉，《中國哲學史》2007 年第 3 期，頁 29-31。龔雋，〈宋明楞嚴學與中國佛教的正統性——以華嚴、天臺《楞嚴經》疏為中心〉，《中國哲學史》2008 年第 3 期，頁 34-43。周黃琴，〈《楞嚴經》的疏解——以陸西星的《楞嚴經說約》，《楞嚴經述旨》為例〉，《宗教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王紅蕾，〈錢謙益《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考論〉，《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3 期。周群，〈晚明文士與《楞嚴經》〉，《江海學刊》2013 年第 6 期。梁銀林，〈蘇軾詩與《楞嚴經》〉，《社會科學研究》2010 年第 1 期。李治華，〈《楞嚴經》與中國宗派〉，《中華佛學研究》第 2 期（1998 年 3 月）。

臺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 取以通顯教。宋明以來，釋子談玄，儒者辟佛，蓋無不涉及《楞嚴》也。[13]

> 此宗教司南，性相總要，一代法門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也。[14]

此外，根據本研究利用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所進行之初步檢索，目前尚存的《楞嚴經》註釋書，從宋朝到清朝，總計有五十六部、三百八十四卷，如附錄一。其中，宋朝有八部、一百零一卷；元朝有一部、二十卷；明朝有三十二部、二百零二卷；清朝有十五部、六十一卷。很顯然的，《楞嚴經》註釋傳統在明朝達到了最頂盛的狀況。不僅如此，就尚存的《楞嚴經》註釋家數和註釋書的內容量（卷數）而言，明朝的《楞嚴經》註釋傳統和宋朝《楞嚴經》註釋傳統，也有顯著的區別。明朝的《楞嚴經》註釋家不僅數量多——總共二十三家，而且身份種類也多——有不同佛教教派的僧侶與居士，也有非佛教的儒家文人與道家的道士；並且，《楞嚴經》註釋書也非常多樣，有句解、疏釋、評林、懸鏡、懸示、摸象記等各式各樣的的體例。相對的，宋朝的《楞嚴經》註釋家的數量比較少——總共八家，而且註釋書的平均卷量也比較厚重——最多有三十卷、最少也有五卷。

另一個問題是：面對如此大量的《楞嚴經》註釋典藏，以往的研究者通常是根據宗派立場，或者個人興趣，量力地、選擇性地聚焦於少數幾部註釋書作研究。如此的研究方法，的確有助於我們了解個別《楞嚴經》註釋書的特色，或者少數幾部註釋書的對比。然而，可能的缺憾是「不識廬山真面目」，不得見一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 呂澂，〈楞嚴百偽〉，頁 370。
[14] 明．智旭，《閱藏知津》，CBETA, J32, no. B271, p. 25, b14-16。

比較巨觀的《楞嚴經》註釋傳統全貌格局。因此，為了彌補這個「見樹不見林」[15]的可能缺憾，本研究企圖利用數位人文的量化分析方法[16]，對於這個以往難得一見的巨觀格局，作一個探索性的遠眺。也就是說，透過大量文本間的「文本重用」（Textual reuse）[17]連結，本研究希望不僅能夠勾勒出巨觀的《楞嚴經》註釋傳統的建構格局，同時也能夠對於「《楞嚴經》註釋書」與「非《楞嚴經》註釋書」之間的可能來龍去脈，作一個粗略的探索。[18]

貳、研究範疇

如前言所述，如果不考慮《楞嚴經》註釋書是否佚失，從唐朝到清朝，就《楞嚴經》註釋家的數量而言，明朝最多，大概佔50%，而宋朝第二，幾乎佔 30%。如果考慮漢傳佛典數位典藏

---

15 「見樹不見林」並非評述現有研究的內容或者成果，而是用來說明本研究方法 (巨觀、大量文本分析方法／見林) 與現有研究的方法 (微觀、少量文本分析方法／見樹) 的區別。不同的研究方法各自有不同的限制和專長。相對而言，本研究方法的限制則是「見林不見樹」。

16 參考項潔等對於「數位人文」的簡單定義：「指的是那些唯有借助數位科技方能進行的人文研究。反過來講，數位人文的研究，即是企圖尋找在前數位時代中難以觀察的現象、無法想像的議題與無法進行的研究。」項潔、涂豐恩，〈導論——什麼是數位人文〉，收入項潔主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頁 11。

17 在現代之前的佛教文獻中，「文本重用」（Textual reuse）是相當普遍的，並且難以避免的現象。Elisa Freschi and Philipp A Maas, *Adaptive Reuse: Aspects of Creativity in South Asian Cultural Histor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7): 20-21. Elisa Freschi and Cathy Cantwell, "Introduction: Reuse and Intertext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Text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33, no. 1-2 (2016): 2. Elisa Freschi, "The Reuse of Texts in Indian Philosophy: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43, no. 2-3 (2015): 99.

18 作為一個累積傳統，註釋傳統的建立和改變通常是時代久遠而且歷時長久，因此一般人不大容易察覺到傳統的建構性。然而，已經有研究顯示：透過註釋傳統中文本間的文字重用關係，我們可以重拾對於傳統建構性的察覺。請參考楊志常，〈晚明《成唯識論》註釋傳統的重新建構——數位量化人文的視角〉，《臺大佛學研究》第 40 期（2020 年 12 月），頁 87。

中，相同時期尚存的五十六部、三百八十四卷的《楞嚴經》註釋書中，明朝也顯然地代表《楞嚴經》註釋傳統的最頂盛的時期，佔有三十二部、二百零二卷的《楞嚴經》註釋書。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範疇將先以三十部、一百九十一卷[19]的明代《楞嚴經》註釋書為中心，並且往前溯源地包括八部、一百零一卷的宋代《楞嚴經》註釋書與一部、二十卷的元代《楞嚴經》註釋書，因為它們是深遠地影響明代《楞嚴經》註釋傳統建構的註釋傳統前身。所以，本研究的主要範疇，總共涵蓋了宋、元、明三代，三十九部、三百一十二卷的《楞嚴經》註釋書。[20]

此外，影響明代《楞嚴經》註釋傳統建構的漢傳佛典文本，不應該僅僅限於宋、元兩代的《楞嚴經》註釋文本。除了作為明代《楞嚴經》註釋傳統前身的宋、元兩代《楞嚴經》註釋傳統不可能建構在真空中外，宋、元、明三代的《楞嚴經》註釋家也難免地要依賴其他「非《楞嚴經》註釋傳統」文本的引用來協助他們解讀，以及支持他們的詮釋。因此，如果將宋、元、明三代，三十九部、三百一十二卷的《楞嚴經》註釋書定義為「《楞嚴經》註釋傳統組」的話，本研究有需要進一步考察「《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外的「組外引用來源」[21]。

---

19 由於科判的文字重用與一般註釋引用的文字重用的性質不同，所以本研究排除其中二部、十一卷的科判——附錄一中的第 14 項和第 39 項。相關的科判重用研究也許值得作另一個專案處理。

20 至於清代以及清代以後的《楞嚴經》註釋傳統，由於是屬於明代《楞嚴經》註釋傳統高峰後的另一個註釋傳統的階段，考慮到研究資源與論文篇幅的限制，本研究決定留待未來處理。

21 「組外引用來源」是指，《楞嚴經》註釋家引用，《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內註釋書以外，《楞嚴經》註釋家可得且其認為相關的任何經典，其中，可能包括非佛教經典。然而，考慮到資源的限制，如下文所示，本研究只能夠在 CBETA 漢傳佛典數位典藏中，限定本研究認為合理且可行的「組外引用來源」範疇。

然而，問題是：若將整個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2]扣除「《楞嚴經》註釋傳統組」當作「組外引用來源」，然後再將組內、組外各部經論依卷分句子為單位，作文本重用比對。如此的作法，不但要消耗大量的計算時間與資源，所產生的大量計算結果也勢必難以作有意義的分析。幸好，錢謙益以藏書家、史學家和考證學家聞名，而且他的《楞嚴經疏解蒙鈔》費時七年、五次易稿，可以堪稱是《楞嚴經》註釋集大成的代表作。[23] 所以，本研究取《楞嚴經疏解蒙鈔》每句前十字，搜尋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中的大正藏（T）、卍續藏（X）、洪武南藏（U）、永樂北藏（P）以及嘉興藏（J），以找尋可能的「組外引用來源」。其中，首先排除清朝以及清朝以後的經典，因為組內的宋、元、明《楞嚴經》註釋家不可能引用參考時間晚於他們的經典；其次，由於許多大正藏的佛典在明代已經佚失，所以排除在卍續藏、洪武南藏、永樂北藏以及嘉興藏中沒有的相對大正藏經典；接著，排除明朝同時代的可能「組外引用來源」，因為除了組內《楞嚴經》註釋書可以勉強排出時間先後秩序，很難一一確定組內和組的相對引用關係；最後，排除已經列入「《楞嚴經》註釋傳統組」的重覆經典。如此，本研究總共找到 670 部經典，可以作為組內明代註書的「組外引用來源」的範疇，而其中 395 部成於宋朝（960-1279）之前，則可以作為組內宋、元代註書的「組

---

[22]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總共有 4,510 部、19,468 卷、223,822,000 個字。參考「CBETA 歷年各項作業成果統計表」，http://cbeta.org/result/statistic.php（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20 日）。

[23] 明．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錢謙益曰：蒙之鈔是經也，創始於辛卯歲之孟陬月，至今年中秋而始具草。歲凡七改，藁則五易矣。」（X13, no. 287, p. 502, c11-12）。連瑞枝，〈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中華佛學學報》第 7 期（1994 年 7 月），頁 357。王紅蕾，〈錢謙益《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考論〉，頁 69。王彥明，〈《楞嚴經疏解蒙鈔》的文獻學價值〉，《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 年第 1 期，頁 67。

外引用來源」的範疇。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工作，在於利用電腦程式比對出「《楞嚴經》註釋傳統組」的典籍之間，以及「《楞嚴經》註釋傳統組」與「組外引用來源」的「文本重用」部分，藉以觀察出各經典之間相互引用的現象，並進行討論分析。為達此目的，我們首先由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的公開資料倉庫[24]，下載所需分析的經典的原始 XML 標記檔案。我們利用程式將這些 XML 標記檔案逐一轉換為簡單文字檔後，並以「卷」為單位，分別存檔。爾後再以程式將進行各卷之間的比對。以下簡單說明比對過程的細節。

在比對過程中，是以每一部典籍、每一卷中的每一句子為單位進行比對。以兩部典籍之間的文字重用比對為例，假設典籍 Work#1 有 10 卷（以符號表示為：W_1J_1, W_1J_2 ... W_1J_{10}），Work#2 也有 10 卷，（以符號表示為：W_2J_1, W_2J_2, ..., W_2J_{10}）。則系統將逐一進行卷與卷之間的比對，也就是由 W_1J_1 vs. W_2J_1 進行到 W_1J_{10} vs. W_2J_{10}，共會進行 100 次卷與卷的比對運算。

在卷與卷比對過程中，系統會先把每一卷的文字內容分割成許多的「句子」，並以句子作為比對的單位，再進行比對。[25] 以 W_1J_1 vs. W_2J_1 的比對為例。假設 W_1J_1 分割成 100 個句子（表

---

[24] CBETA XML P5 版本的資料公開倉庫。網址為：https://github.com/cbeta-org/xml-p5。

[25] 在本研究中，句子的定義是根據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中，所提供的新式標點為基礎。我們選擇三個標點符號「？、！、。」作為分句的依據。主要是因為，這三個標點符號，通常代表語意的完結，因此由該標點符號截斷的區域，可以視為一個擁有完整語意的句子。但目前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仍有許多典籍尚未有新式標點。針對這些沒有新式標點的典籍，我們先利用古籍酷（http;//gj.cool）網站的 AI 自動標點功能進行標注。

示為：$W_1J_1S_1$, $W_1J_1S_1$, ..., $W_1J_1S_{100}$）；W2-J1 也分割成 100 個句子（表示為：$W_2J_1S_1$, $W_2J_1S_2$, ..., $W_2J_1S_{100}$）。然後系統進行句子與句子之間作逐一比對時，共會進行一萬個「句對句」的比對（$W_1J_1S_1$ vs. $W_2J_1S_1$, ... $W_1J_1S_{100}$ vs. $W_2J_1S_{100}$）。

實際上在兩句的文字中，出現隨機的幾個字重複是相當常見的狀況，但這些隨機重複，並不一定意味著文句之間具有相互重用的現象。因此一個足夠數量的文字重複是偵測文句重用現象的一個重要條件。另外，考慮到在實際的經文狀況中，文字重用的發生，並不一定會完全參照原句，而是經常會有插入幾個字，或刪掉幾個原句用字的現象，如下例：

《楞嚴經集註》卷 3：「相宗說七識為心根。是不可見法。非同色法可見。勝義也。若肉搏心。即形如蓮華。上有七葉。即浮塵根也。」[26]

《楞嚴經義疏釋要鈔》卷 4：「相宗說七識為心根。是不可見法。非同色法可見。即勝義也。若肉摶心。即形如蓮華。上有七葉。即浮塵也。」[27]

很明顯上述兩文句內容具有極高的重複現象，但《楞嚴經義疏釋要鈔》的句子多了一個「即」字，並且使用「摶」字取代「搏」字。雖然僅是極小差異，但這也打破了文字連續重複的情況。因此在文句比對的過程中，我們要尋找的目標，除了兩文句之間具有一定數量的字元重複之外，這些重複也必須在密集的區域內發生，且比對過程中能夠忽略少數差異，找出大規模

[26] 宋．思坦，《楞嚴經集註》，CBETA, X11, no. 268, p. 305, a3-5// R17, p. 146a3-5// Z 1: 17, p. 73, c3-5。

[27] 宋．懷遠，《楞嚴經義疏釋要鈔》，CBETA, X11, no. 267, p. 124, a8-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重複的事實。因此，我們採用生物資訊領域的 Smith-Waterman 演算法[28] 進行文字的比對，就像進行 DNA 比對序列（Sequence Alignment）一樣，以找出我們需要的文字重用句對。

Smith-Waterman 演算法經常用於進行兩組 DNA 序列的比對，以找出兩序列間最佳的排比區域。該演算法在進行比對時，是以評分的方式來衡量兩序列的比對結果。當兩序列中的對比區域內相同位置具有相同文字時，便可得到正向加分，反之，同一位置之文字不同，或是出現某一文句出現插入文字或刪除文字時，便給予扣分。本研究採用的評分規則如下所述：

- match_score：3（同一位置雙方文字相同，加 3 分）
- mismacth_penalty：-3（同一位置雙方文字不同時扣 3 分）
- gap_penalty：-3（某一位置的文字在對方文句中不存在，即插入或刪除文字，扣 3 分）

將 Smith-Waterman 的演算方式用於文句比對時，可以成功找出兩文句中具有最高分比對的區域。也因為是採評分制，因此少許的用字差異或新增刪除部分文字，並不會中斷程式比對，而僅是降低評分結果。程式在執行過程中，將嘗試兩文句各種對比可能性，從其中找出一組最高分的評分結果作為該文句組的比對結果。例如，比對下述兩文句時

- T0945 S1「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從始洎終念念生滅」
- X0287 S2「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念念生滅」，

所找到的最佳排比方式為：

[28] T.F. Smith and M.S. Waterman,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molecular subsequences,” *J Mol Biol*. 147, no.1 (1981): 195-197.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 「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念念生滅」

也就是說，在認為 S2 缺漏 4 字的情況下，可以找到最好的排比方式。而該方式中，兩句共有 12 字重複與 4 字差異，得 24 分。

在利用上述之 Smith-Waterman 的演算法，所將找出的各文句組的最佳排比結果後，我們也會再以程式逐一檢查，保留兩文句的最佳比對區域內包含超過 10 個字的結果，並認定這些句組之間為具有文句重用現象的句組[29]。爾後以此為基礎，累計出經典與經典之間的重用文字數，並以這些數據大規模的進行經典間文字重用的觀察與分析。

肆、探索性的遠眺

一、文本重用的遠眺——組內

首先，就《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內的三十九部、三百一十二卷的《楞嚴經》註釋書，本研究發現：組內的文本重用字數平均大概佔文本總字數的 41%，如表 1[30]。如此高的組內文本重用比率似乎顯示：《楞嚴經》註釋傳統有相當高的傳統延續性和社群性[31]。

---

29 本研究目前設定「十個字相同」的想法是：1）若設定相同的字數太小，一是造成計算量會爆增，二是恐怕重複字數太少似乎很難確立是有意義的重用；2）若設定相同的字數太大，雖然可以比較確定是刻意的重複，卻也可能忽略了許多可能意義的重用。因此，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的絕對正確設定，本研究傾向於建議由文本專家自己視研究情況而定。

30 由於篇幅限制，圖表統一使用的代碼 G#1~G#39。請參考附錄一，對照代碼 G#1~G#39 所代表的《楞嚴經》註釋書。

31 《楞嚴經》註釋傳統「社群性」是指，《楞嚴經》註釋傳統傳統組內的文本重用，也就是《楞嚴經》註釋家間的引用。類似的實際案例，請參考楊志常，〈晚明《成唯識論》註釋傳統的重新建構——數位量化人文的視角〉，《臺大佛學研究》第 40 期（2020 年 12 月），頁 112-114。

表 1　組內文本重用比率

無重用	組內重用字數	文本總字數
3,504,711	2,391,468	5,896,179
59%	41%	100%

不過，41% 的組內文本重用比率只是一個非常粗略的平均值。如果對於《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內的三十九部的本重用比率，作各別的比較，將會發現：文本重用比率的組內變異相當大，如圖 1。如此大的組內變異似乎提醒：組內各別文本的傳統延續性和社群性並不同質，而且有相當大的可能差異空間，不可一概而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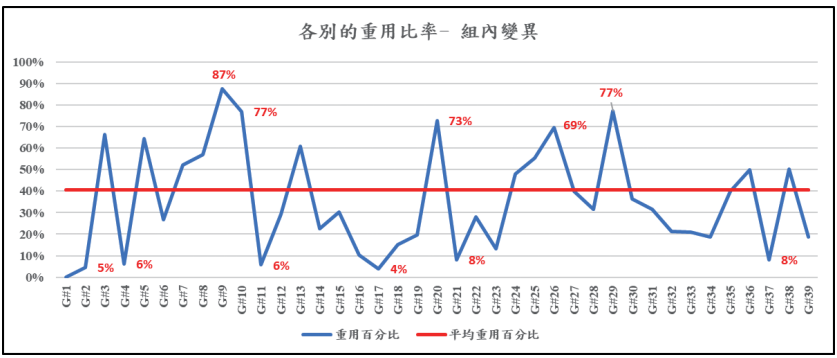


圖 1　各別的重用比率——組內變異

接著，如果我們考慮到《楞嚴經》註釋書體例的多樣性，而且粗略地將《楞嚴經》註釋書分成兩種：一、至少十卷以上，有逐句解釋《楞嚴經》的註釋書，如圖 2；二、少於十卷的註釋書，例如疏釋要鈔、熏聞記、評林、懸鏡、懸示、摸象記等，如圖 3。如圖 2 所示，至少有十卷以上的註釋書總有二十四部，其中有十三部的重用比率大於平均的 41%，大概佔一半強。值得注意是，明代最具爭議性的真鑒《楞嚴經正脈疏》（G#14）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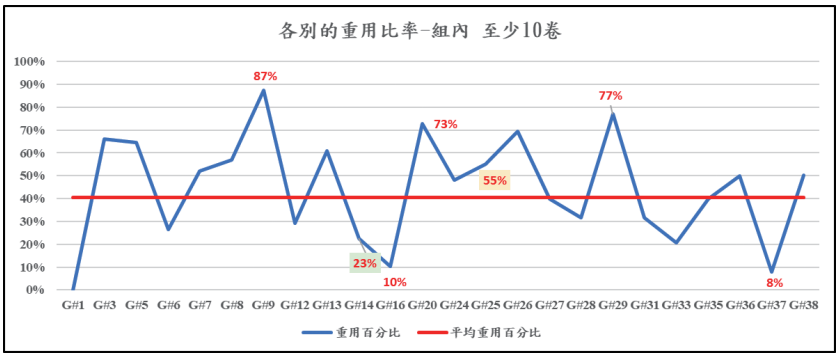


圖 2　各別的重用比率——組內至少 10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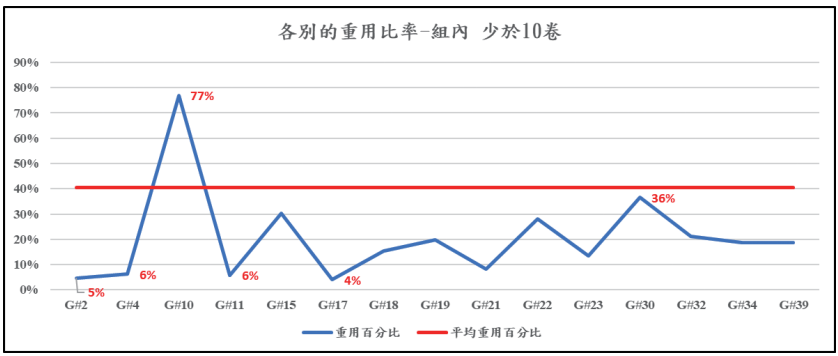


圖 3　各別的重用比率——組內少於 10 卷

組內重用比率只有 23%，低於平均值；而站在其對立面的傳燈《楞嚴經圓通疏》（G#25）的組內重用比率卻高於平均值，為 55%。

此外，少於十卷的十五部註釋書，由於多是屬於作者自述臆說、要義，如預期地，重用比率絕大部份皆低於平均值，其中唯一例外是焦竑的《楞嚴經精解評林》（G#10），重用比率竟高達 77%，以下本研究會作進一步的探索。

以下，首先進一步分析圖 2 中，第一高重用比率 87% 的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朝惟則的《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會解》（G#9），以及第二高重用比率 77% 的明朝鍾惺的《楞嚴經如說》（G#29）。

如圖 4 所示，元朝惟則《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會解》的文本重用中，48% 的引用來自於宋朝子璿的《首楞嚴義疏注經》（G#1），25% 來自於宋朝咸輝的《首楞嚴經義海》（G#3），23% 來自於宋朝戒環的《楞嚴經要解》（G#7），前三大引用已經佔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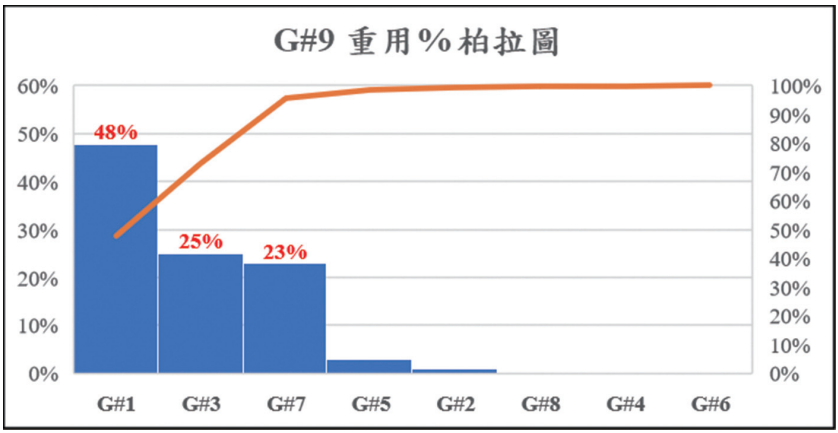


圖 4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會解》（G#9）的重用 % 柏拉圖

而明朝鍾惺《楞嚴經如說》的文本重用中，如圖 5 所示，55% 的引用來自於宋朝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17% 來自於明朝通潤《楞嚴經合轍》（G#27），7% 來自於明朝真鑒《楞嚴經正脈》（G#14），7% 來自於宋朝戒環的《楞嚴經要解》（G#7），4% 宋朝咸輝的《首楞嚴經義海》。前四大引用約佔 90%。雖然宋朝子璿註釋對於明朝鍾惺的影響仍然非常深遠，這裡我們同時注意到，明朝註釋家通潤和真鑒註釋的重要性，對於明朝鍾惺而言，相對地比其他宋、元朝註釋家重要。這似乎反映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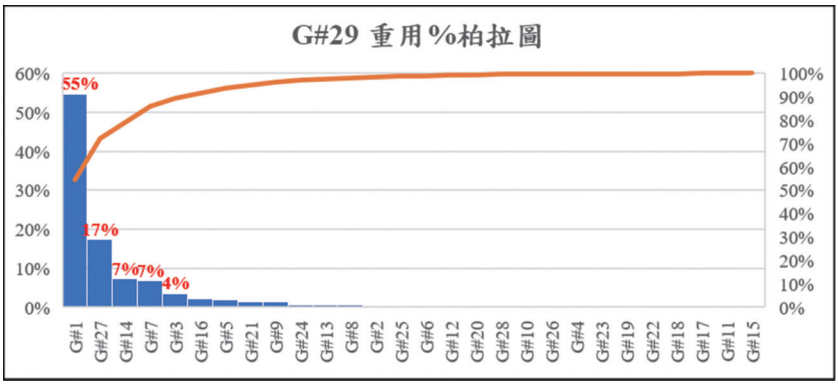


圖 5　鍾惺《楞嚴經如說》（G#29）的重用 % 柏拉圖

明朝楞嚴經註釋傳統的時代性[32]。

接著，我們比較明代最具爭議性的真鑒《楞嚴經正脈疏》（G#14）和站在其對立面的傳燈《楞嚴經圓通疏》（G#25）的各別重用 % 柏拉圖。如圖 6 所示，真鑒《楞嚴經正脈疏》中的文本重用有高達 74% 來自於子璿的《首楞嚴義疏注經》。相對的，雖然《首楞嚴義疏注經》也是傳燈《楞嚴經圓通疏》的第一高重用 % 的引用來源。比率只有 41%，如圖 7 所示。除此之外，其實兩者前五大引用來源是一樣的，只是《首楞嚴經義海》（G#3）vs.《楞嚴經要解》（G#7）與《楞嚴經集註》（G#5）vs.《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會解》（G#9）的先後秩序，彼此有點不同。

32 所謂的「時代性」，筆者意指：傳統的建構經常是相當近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新時局的反應，卻以舊情境相關的形式出現。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楊志常，〈晚明《成唯識論》註釋傳統的重新建構——數位量化人文的視角〉，《臺大佛學研究》第 40 期（2020 年 12 月），頁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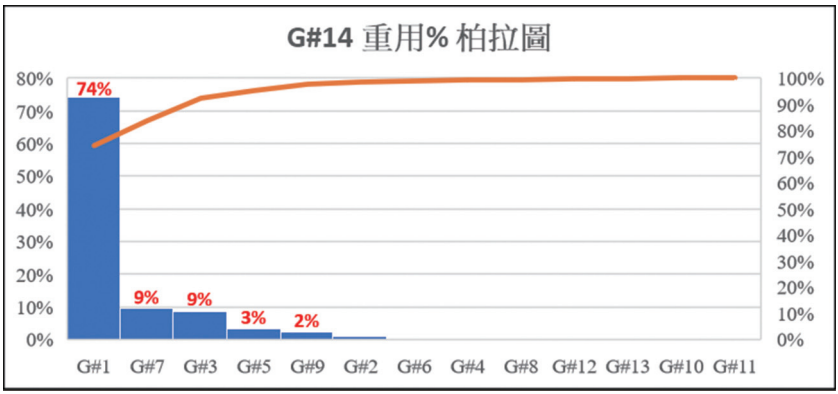


圖 6　真鑒《楞嚴經正脈疏》（G#14）的重用 % 柏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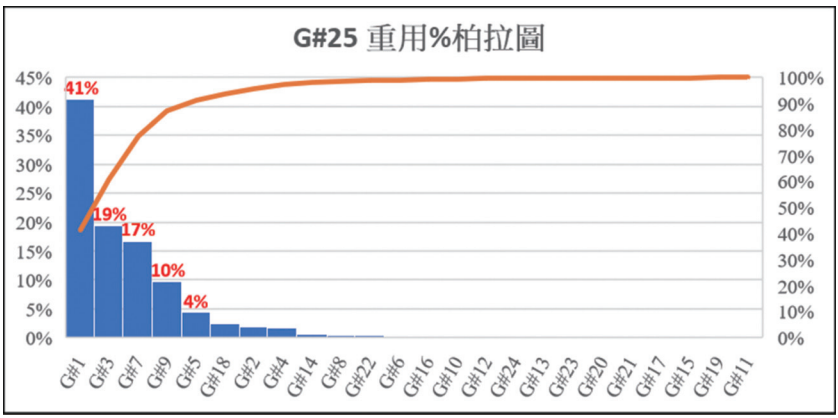


圖 7　傳燈《楞嚴經圓通疏》（G#25）的重用 % 柏拉圖

再來，我們要進一步分析兩部明代《楞嚴經》註釋書：一、成立最早的焦竑《楞嚴經精解評林》；二、集大成的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

在圖 3 有關於少於十卷的十五部註釋書中，我們注意到焦竑《楞嚴經精解評林》的重用比率異常地高。由於焦竑是明代著名的考證學家，我們有興趣了解一下《評林》的主要引用來源。如圖 8 所示，《評林》的文本重用的前五大引用來源依序為：46%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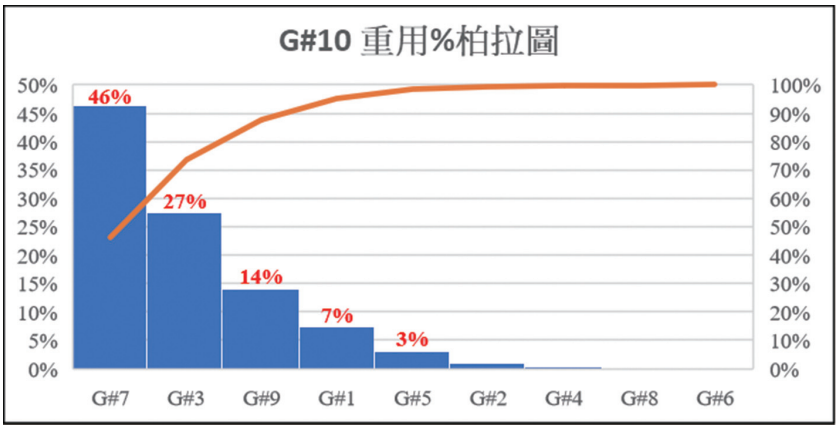


圖 8　焦竑《楞嚴經精解評林》的重用 % 柏拉圖

的戒環《楞嚴經要解》、27% 的咸輝《首楞嚴經義海》、14% 的惟則《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會解》、7% 的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以及 3% 的思坦《楞嚴經集註》。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不同於大部份註釋家都以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為最大組內引用來源，焦竑獨鍾於戒環的《要解》，並且把咸輝《義海》和惟則的《會解》引用優先於子璿的《義疏注經》。如此的現象也許值得進一步的深究。

另一方面，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文本重用累積比率超 90% 的引用來源，如圖 9 所示依序為：53% 的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10% 的咸輝《首楞嚴經義海》、7% 的思坦《楞嚴經集註》、5% 的曾鳳儀《楞嚴經宗通》（G#12）、4% 的戒環《楞嚴經要解》、4% 的德洪《楞嚴經合論》（G#8）、3% 的仁岳《楞嚴經熏聞記》（G#4）、2% 的通潤《楞嚴經合轍》和 2% 的德清《楞嚴經通議》（G#24）。除了佔五成以上的引用來自於子璿《義疏注經》外，我們看到錢謙益引用了所有他之前的組內註釋書，只是引用比率有別。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註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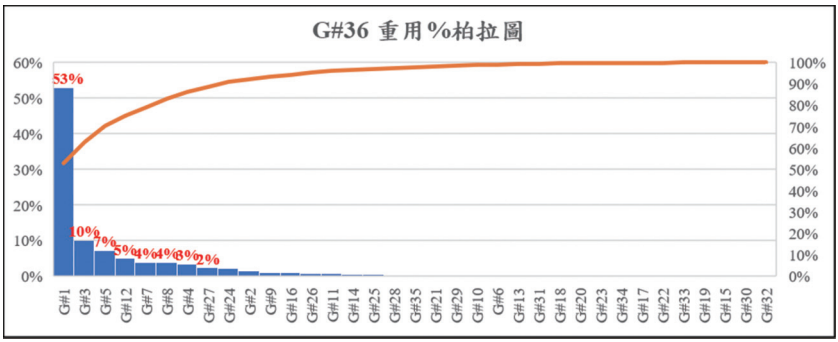


圖 9　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的重用 % 柏拉圖

中，錢謙益引用最多的，不是他以「海印弟子」自稱的師父德清，也不是與他甚有交遊的通潤，卻是曾鳳儀的《宗通》，這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最後，本研究進一步考察組內註釋書被重用比率的柏拉圖。如圖 10 所示，在三十九部組內的《楞嚴經》註釋書中，被引用最多的是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佔所有組內文本重用字數的 61%。毫無疑問，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是《楞嚴經》註釋傳統中的聖經。它不僅是目前尚存最早的《楞嚴經》註釋書，也是最具有影響力的《楞嚴經》註釋書。差距甚遠的第二、第三名是咸輝的《義海》和戒環的《要解》，分別被重用的百分比只有 9% 和 8%。而明朝被引用最多註釋書為真鑒《正脈疏》，其被重用的百分比超過 2%，無論是正面的或者負面的引用，都超過傳燈《圓通疏》的不到 0.4%。如果有人以為《圓通疏》比較低的被重用比是由於傳燈《圓通疏》的成書較晚，那也不盡然。通潤《合轍》比《圓通疏》的成書更晚，《合轍》的被重用卻緊接在《正脈疏》，也大概有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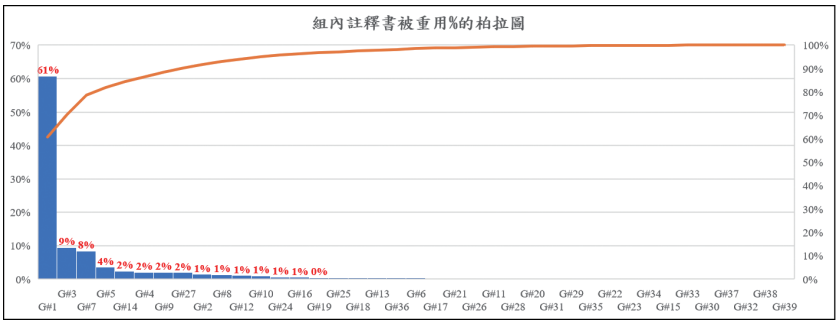


圖 10　組內註釋書被重用比率的柏拉圖

由於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被組內重用的比率如此之高，本研究進一步考察，《首楞嚴義疏注經》的重用字數可以佔引用文本總字數的多少百分比。如圖 11 所示，《首楞嚴義疏注經》的重用字數佔引用文本總字數的百分比，最高可達 66%。也就是說，咸輝《義海》總字數的 66% 是《首楞嚴義疏注經》的重用。緊接在後的是，德洪《合論》的 52%，戒環《要解》的 49%，凌弘憲《楞嚴經證疏廣解》（G#26）的 48%，以及德清《通議》的 42%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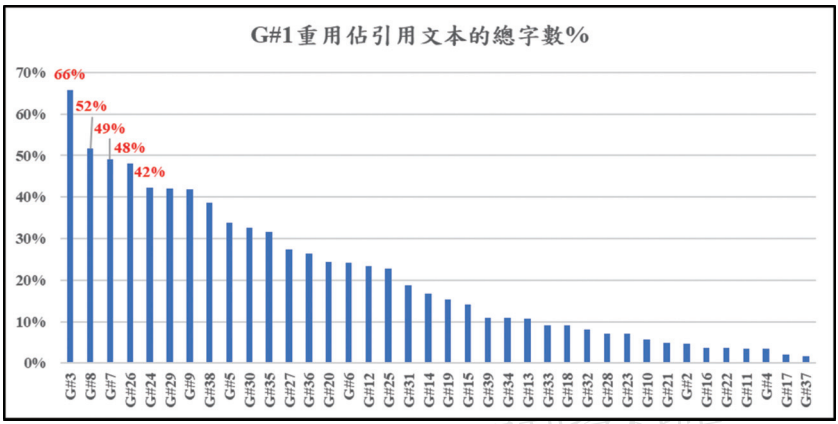


圖 11　《首楞嚴義疏注經》重用佔引用文本的總字數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透過真鑒《正脈疏》重用佔引用文本的總字數 % 的分析如圖 12，和傳燈《圓通疏》重用佔引用文本的總字數 % 的分析如圖 13，我們可以觀察到：5.7% 的觀衡《楞嚴經四依解》（G#31）、5.6% 的鍾惺《楞嚴經如說》（G#29）、5.4% 的乘時《楞嚴經講錄》（G#28）、3.5% 的通潤《合轍》和 2.1% 的元賢《楞嚴經略疏》等，是《正脈疏》的重用。相對的，5.7% 的《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科解》（G#32）、1.3% 的智旭《楞嚴經文句》（G#35）、1% 的一松《楞嚴經秘錄》（G#37）、0.5% 的智旭《楞嚴經玄義》等，是《圓通疏》的重用。以上的觀察有助於我們了解真鑒《正脈疏》和傳燈《圓通疏》的影響力，以及其影響力所及的社群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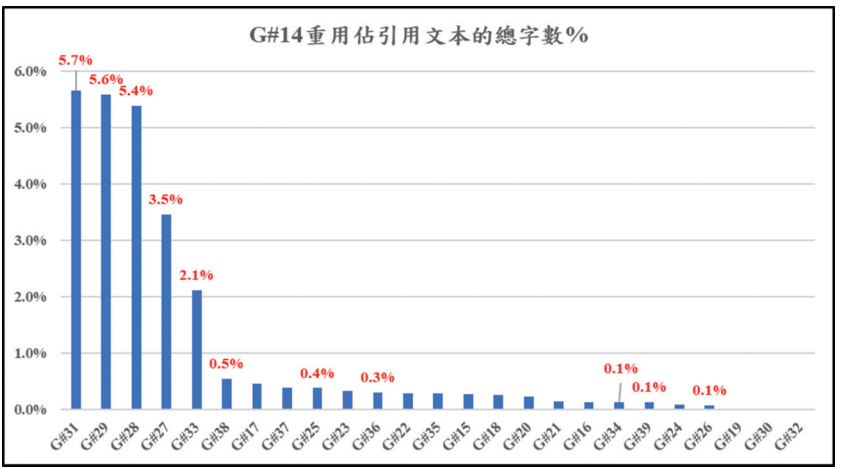


圖 12　《楞嚴經正脈疏》重用佔引用文本的總字數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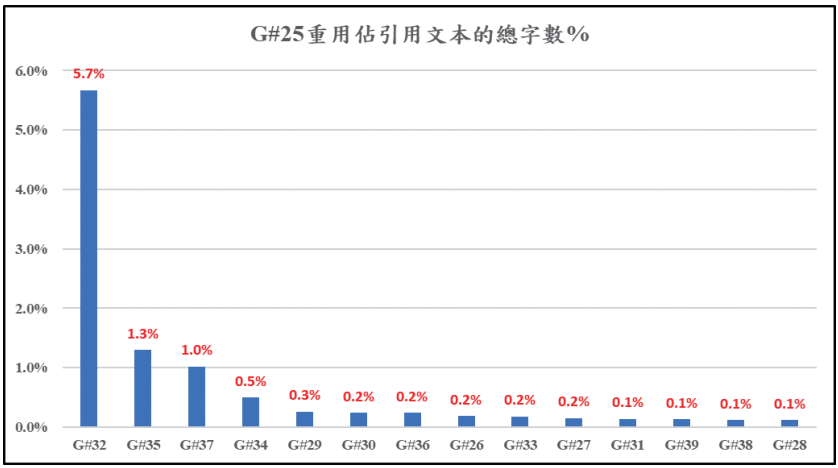


圖 13　《楞嚴經圓通疏》重用佔引用文本的總字數 %

二、文本重用的遠眺——組內＋組外

上一節的考察只聚焦於《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內的三十九部、三百一十二卷註釋書的文本重用。本節將擴大考察的範疇，把組內註釋書可能引用的組外引用來源加進來，總共包括額外的 670 部經典。

表 2 是對於組內和組外文本重用分析的概要統計。其中，我們可以發現：表 1 中的 41%「組內文本重用」，可以進一步分解，成為表 2 中的 30%「僅與組內重用」與 11% 的「組內和組外重疊的重用」。而且，「僅與組外重用」的比率為 7%。

表 2　組內＋組外文本重用比率

無重用	僅與 組內重用	僅與 組外重用	組內和組外 重疊的重用	文本總字數
3,102,784	1,748,034	401,927	643,434	5,896,179
53%	30%	7%	11%	1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果我們將組內三十九部的組內和組外文本重用比率畫成折線圖如圖 14，我們可以察覺到至少二件事情：一、表 2 所呈現只是平均的組內和組外文本重用的比率，文本間的重用比率，其實是有相當大變異；二、除了少數的例外，基本上，「僅與組內重用 %」、「僅與組外重用 %」以及「組內和組外重疊的重用 %」有一定的相互關係——「僅與組內重用 %」最大，「僅與組外重用 %」最小，而「組內和組外重疊的重用 %」在中間。如此的相互關係，不僅反映了《楞嚴經》註釋傳統的社群性，也表現研究資源的局限性。畢竟，絕大部份註釋家不可能有機會且有能力閱讀整部大藏經，並且充分引用整部大藏經。註釋家最有可能且最可行的研究基礎和資源，是以他們繼承，以及能夠接觸的《楞嚴經》註釋傳統社群性為範疇，然後作有限的延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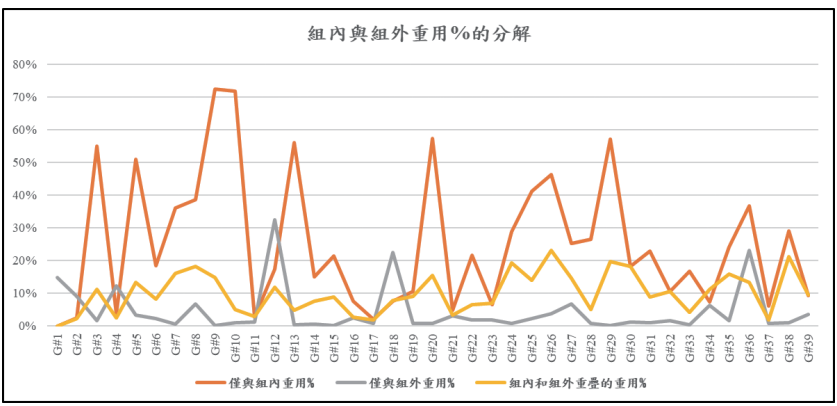


圖 14　組內與組外重用 % 的分解

以上第二點的少數例外，有仁岳《熏聞記》（G#4）、曾鳳儀《宗通》（G#12）、傳燈《玄義》（G#18），以及錢謙益《蒙鈔》（G#36），他們的「僅與組外重用 %」特別高。其中，如果不考慮卷數少於十卷的特別註釋體例，如《熏聞記》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玄義》，曾鳳儀《宗通》和錢謙益《蒙鈔》的組外引用來源，便值得進一步檢視。

如表 3 所示，曾鳳儀《宗通》的前十五大的組外引用來源，與所有組內平均和錢謙益《蒙鈔》的前十五大的組外引用來源，顯然不同。曾鳳儀似乎更著重於援引用禪師語錄和維摩詰經相關經注，作為他的組外引用來源，頗有特色。

表 3　前十五大的組外引用來源——組內平均、曾鳳儀《宗通》、錢謙益《蒙鈔》

	所有組內平均		曾鳳儀 楞嚴經宗通		錢謙益 楞嚴經疏解蒙鈔	
#1	宗鏡錄	15%	宗鏡錄	12%	宗鏡錄	18%
#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6%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7%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8%
#3	大智度論	3%	雲門匡真禪師語錄	5%	大智度論	6%
#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3%	維摩詰所說經	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5%
#5	華嚴經合論	3%	注維摩詰經	4%	法苑珠林	4%
#6	法苑珠林	3%	華嚴經合論	4%	經律異相	3%
#7	圓覺經大疏	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3%	華嚴經合論	3%
#8	圓覺經略疏鈔	2%	大方廣佛華嚴經	2%	瑜伽師地論	2%
#9	大方廣佛華嚴經	2%	趙州和尚語錄	2%	摩訶止觀	2%
#10	摩訶止觀	2%	大智度論	2%	新華嚴經論	2%
#11	妙法蓮華經玄義	2%	添品妙法蓮華經	2%	妙法蓮華經文句	2%
#12	瑜伽師地論	1%	妙法蓮華經	2%	圓覺經略疏鈔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有組內平均		曾鳳儀 楞嚴經宗通		錢謙益 楞嚴經疏解蒙鈔	
#13	大般涅槃經（T0375）	1%	釋摩訶衍論通玄鈔	2%	大般涅槃經（T0375）	2%
#14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	1%	說無垢稱經	2%	大般涅槃經（T0374）	2%
#15	大般涅槃經（T0374）	1%	諸方門人參問語錄	2%	圓覺經大疏	2%

另一方面，根據圖 10 組內註釋書被重用比率的柏拉圖，子璿《注經》和咸輝《義海》是組內被重用文本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所以我們比較所有組內平均、子璿《注經》和咸輝《義海》的前十五大的組外引用來源，如表 4。我們可以發現：《宗鏡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圓覺經大疏》和《圓覺經略疏鈔》，似乎一開始就已經成為《楞嚴經》註釋傳統的重要組外引用來源。

表 4　前十五大的組外引用來源——組內平均、子璿《注經》、咸輝《義海》

	所有組內平均		子璿 首楞嚴義疏注經		咸輝 首楞嚴經義海	
#1	宗鏡錄	15%	宗鏡錄	30%	宗鏡錄	11%
#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6%	圓覺經大疏	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5%
#3	大智度論	3%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	5%	妙法蓮華經文句	3%
#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3%	圓覺經略疏鈔	4%	成唯識論	3%
#5	華嚴經合論	3%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3%	圓覺經大疏	3%

臺灣大學圖書資料庫

	所有組內平均		子璿 首楞嚴義疏注經		咸輝 首楞嚴經義海	
#6	法苑珠林	3%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2%	圓覺經略疏鈔	3%
#7	圓覺經大疏	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2%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2%
#8	圓覺經略疏鈔	2%	萬善同歸集	1%	妙法蓮華經玄義	2%
#9	大方廣佛華嚴經	2%	大乘起信論	1%	大般涅槃經（T0375）	2%
#10	摩訶止觀	2%	大方等大集經	1%	大般涅槃經（T0374）	2%
#11	妙法蓮華經玄義	2%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	1%	華嚴經合論	2%
#12	瑜伽師地論	1%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	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2%
#13	大般涅槃經（T0375）	1%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	1%	摩訶止觀	2%
#14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	1%	釋摩訶衍論通玄鈔	1%	新華嚴經論	2%
#15	大般涅槃經（T0374）	1%	華嚴經疏鈔玄談	1%	觀音義疏	2%

此外，如果我們比較所有組內平均、真鑒《正脈疏》、傳燈《圓通疏》的前十五大的組外引用來源如表 5，我們可以特別地注意到：不同於一般《楞嚴經》註釋家都以《宗鏡錄》為第一且最主要的組外引用來源，真鑒《正脈疏》卻援引華嚴宗祖師澄觀（737-838）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多於《宗鏡錄》，而傳燈《圓通疏》則引用天台宗祖師智顗（538-59）撰的《法界次第初門》多於《宗鏡錄》。再注意到：真鑒著重於援引澄觀撰的《華嚴經疏鈔玄談》和宗密（780-841）撰的《華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5　前十五大的組外引用來源——組內平均、真鑒《正脈疏》、傳燈《圓通疏》

	所有組內平均		真鑒 楞嚴經正脈疏		傳燈 楞嚴經圓通疏	
#1	宗鏡錄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10%	法界次第初門	16%
#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6%	宗鏡錄	8%	宗鏡錄	7%
#3	大智度論	3%	華嚴經疏鈔玄談	8%	法苑珠林	7%
#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3%	華嚴經合論	7%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4%
#5	華嚴經合論	3%	大方廣佛華嚴經	6%	摩訶止觀	3%
#6	法苑珠林	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4%	止觀輔行傳弘決	3%
#7	圓覺經大疏	2%	圓覺經略疏鈔	4%	長阿含經	2%
#8	圓覺經略疏鈔	2%	圓覺經大疏	4%	妙法蓮華經玄義	2%
#9	大方廣佛華嚴經	2%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	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2%
#10	摩訶止觀	2%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	3%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2%
#11	妙法蓮華經玄義	2%	成唯識論	2%	觀心論疏	2%
#12	瑜伽師地論	1%	大方廣佛華嚴經	2%	華嚴經合論	1%
#13	大般涅槃經（T0375）	1%	大乘起信論	2%	圓覺經大疏	1%
#14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	1%	妙法蓮華經	1%	圓覺經略疏鈔	1%
#15	大般涅槃經（T0374）	1%	添品妙法蓮華經	1%	大日經義釋演密鈔	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

經行願品疏鈔》，而傳燈重於援引智顗講述的《摩訶止觀》和妙《法蓮華經玄義》。如此組外引用來源的差異似乎明白地說明了真鑒和傳燈的強烈的宗派色彩。

另外，也許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傳燈比一般《楞嚴經》註釋家引用更多的《法苑珠林》，而真鑒引用更多的《成唯識論》。

伍、結語

本研究的研究範疇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楞嚴經》註釋傳統組，涵蓋了宋、元、明三代，三十九部、三百一十二卷的《楞嚴經》註釋書；二、《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可能引用的「組外引用來源」，總共六百七十部、五千二百七十七卷。面對如此大量的《楞嚴經》註釋書與相關典藏，以往的研究者通常只能選擇性地聚焦於少數幾部註釋書作研究。如此研究方法的可能缺憾是「不識廬山真面目」，不得見一個比較巨觀的《楞嚴經》註釋傳統全貌格局。為了彌補這個「見樹不見林」的可能缺憾，本研究企圖利用數位人文的量化分析方法——大量文本間的「文本重用」分析，對於這個以往難得一見的巨觀格局，作一個探索性的遠眺。

就《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內文本重用的遠眺而言，本研究發現：組內的文本重用字數平均大概佔文本總字數的 41%。如此高的組內文本重用比率似乎意含著，在《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內中，有相當高的傳統延續性和社群性。不過，文本重用比率的組內變異相當大，這似乎提醒：組內各別文本的傳統延續性和社群性並不同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進一步，對於組內第一高重用比率的元朝惟則的《會解》與第二高重用比率的明朝鍾惺的《如說》作重用比率的柏拉圖分析，本研究發現：明朝註釋家通潤和真鑒的註釋對於明朝鍾惺而言，相對地比其他宋、元朝註釋家重要。這似乎反映明朝楞嚴經註釋傳統的時代性。

而考察組內註釋書「被重用比率」的柏拉圖，本研究發現：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佔所有組內文本重用字數的 61%。毫無疑問，子璿《注經》不僅是目前尚存最早的《楞嚴經》註釋書，也是最具有影響力的《楞嚴經》註釋書。

此外，透過真鑒《正脈疏》被引用字數佔引用文本的總字數 % 的分析，與傳燈《圓通疏》被引用字數佔引用文本的總字數 % 的分析，有助於我們了解真鑒《正脈疏》和傳燈《圓通疏》的影響力，以及其影響力所及的社群對象。

另一面，就《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內和組外文本重用的遠眺而言，本研究發現：「組內文本重用」可以進一步分解成 30%「僅與組內重用」與 11% 的「組內和組外重疊的重用」，而「僅與組外重用」的比率為 7%。並且，除了少數的例外，「僅與組內重用 %」、「僅與組外重用 %」以及「組內和組外重疊的重用 %」似乎維持著一定的相互關係——「僅與組內重用 %」最大，「僅與組外重用 %」最小，而「組內和組外重疊的重用 %」在中間。畢竟，絕大部分註釋家不可能有機會且有能力閱讀整部大藏經。如此的相互關係似乎反映出一個註釋傳統建構的巨觀格局：註釋家最有可能且最可行的研究基礎和資源，是以他們繼承，以及能夠接觸的《楞嚴經》註釋傳統社群性為範疇，然後作有限的延申。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本研究發現，考察前十五大的組外引用來源有助於了解《楞嚴經》註釋傳統組內的異同可能來源。例如，比較所有組內平均、子璿《注經》和咸輝《義海》的前十五大的組外引用來源，讓我們察覺到：《宗鏡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圓覺經大疏》和《圓覺經略疏鈔》，似乎一開始就已經成為《楞嚴經》註釋傳統的重要共同的組外引用來源。又例如，比較所有組內平均、真鑒《正脈疏》、傳燈《圓通疏》的前十五大的組外引用來源，我們可以特別地注意到：不同於一般《楞嚴經》註釋家都以《宗鏡錄》為第一且最主要的組外引用來源，真鑒《正脈疏》卻援引華嚴宗祖師澄觀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多於《宗鏡錄》，而傳燈《圓通疏》則引用天台宗祖師智顗撰的《法界次第初門》多於《宗鏡錄》。如此組外引用來源的差異，似乎明白地說明了真鑒和傳燈的強烈的宗派色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宋、明、清朝的《楞嚴經》註釋書列表

項目	朝代	作者	篇名	經論編碼	卷數	代碼
1	宋	子璿	首楞嚴義疏注經	T39n1799	10	G#1
2	宋	懷遠	楞嚴經義疏釋要鈔	X11n0267	6	G#2
3	宋	咸輝	首楞嚴經義海	P168n1581	30	G#3
4	宋	仁岳	楞嚴經熏聞記	X11n0269	5	G#4
5	宋	思坦	楞嚴經集註	X11n0268	10	G#5
6	宋	可度	楞嚴經箋	X11n0271	10	G#6
7	宋	戒環	楞嚴經要解	X11n0270	20	G#7
8	宋	德洪	楞嚴經合論	X12n0272	10	G#8
9	元	惟則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會解	P185n1618	20	G#9
10	明	焦竑	楞嚴經精解評林	X15n0301	3	G#10
11	明	德清	楞嚴經懸鏡	X12n0277	1	G#11
12	明	曾鳳儀	楞嚴經宗通	X16n0318	10	G#12
13	明	真界	楞嚴經纂注	X15n0300	10	G#13
14	明	真鑒	楞嚴經正脈疏科	X12n0273	10	N/A
15	明	真鑒	楞嚴經正脈疏	X12n0275	10	G#14
16	明	陸西星	楞嚴經說約	X14n0294	1	G#15
17	明	廣莫	楞嚴經直解	X14n0298	10	G#16
18	明	真鑒	楞嚴經正脉疏懸示	X12n0274	1	G#17
19	明	傳燈	楞嚴經玄義	X13n0282	4	G#18
20	明	傳如	楞嚴經截流	X14n0296	2	G#19
21	明	陸西星	楞嚴經述旨	X14n0295	10	G#20
22	明	袾宏	楞嚴經摸象記	X12n0276	1	G#21
23	明	傳燈	楞嚴經圓通疏前茅	X14n0297	2	G#22
24	明	圓澄	楞嚴經臆說	X12n0280	1	G#23
25	明	德清	楞嚴經通議	X12n0279	10	G#24
26	明	傳燈	楞嚴經圓通疏	X12n0281	10	G#25
27	明	凌弘憲	楞嚴經證疏廣解	X14n0288	10	G#26
28	明	通潤	楞嚴經合轍	X14n0289	10	G#27
29	明	乘時	楞嚴經講錄	X15n0299	10	G#28
30	明	鍾惺	楞嚴經如說	X13n0286	10	G#29
31	明	觀衡	楞嚴經懸談	X14n0293	1	G#30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術期刊資料庫

項目	朝代	作者	篇名	經論編碼	卷數	代碼
32	明	觀衡	楞嚴經四依解	D17n8862	10	G#31
33	明	正相	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科解	X16n0310	1	G#32
34	明	元賢	楞嚴經略疏	X15n0302	10	G#33
35	明	智旭	楞嚴經玄義	X13n0284	2	G#34
36	明	智旭	楞嚴經文句	X13n0285	10	G#35
37	明	錢謙益	楞嚴經疏解蒙鈔	X13n0287	10	G#36
38	明	一松	楞嚴經秘錄	X13n0283	10	G#37
39	明	函昰	楞嚴經直指科文	X14n0290	1	N/A
40	明	函昰	楞嚴經直指	X14n0291	10	G#38
41	明	大韶	楞嚴經擊節	X14n0292	1	G#39
42	清	劉道開	楞嚴經貫釋	X15n0303	10	N/A
43	清	靈耀	楞嚴經觀心定解科	X15n0304	1	N/A
44	清	靈耀	楞嚴經觀心定解大綱	X15n0305	1	N/A
45	清	靈耀	楞嚴經觀心定解	X15n0306	10	N/A
46	清	通理	楞嚴經指掌疏懸示	X16n0307	1	N/A
47	清	通理	楞嚴經指掌疏	X16n0308	10	N/A
48	清	通理	楞嚴經指掌疏事義	X16n0309	1	N/A
49	清	續法	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	X16n0311	2	N/A
50	清	行策	楞嚴經勢至圓通章解	X16n0312	1	N/A
51	清	諦閑	楞嚴經序指味疏	X16n0313	1	N/A
52	清	溥畹	楞嚴經寶鏡疏科文	X16n0314	1	N/A
53	清	溥畹	楞嚴經寶鏡疏懸談	X16n0315	1	N/A
54	清	溥畹	楞嚴經寶鏡疏	X16n0316	10	N/A
55	清	濟時	楞嚴經正見	X16n0317	10	N/A
56	清	淨挺	閱經十二種—楞嚴問答	X37n0674_006	1	N/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原典與古籍（關於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楞嚴經》相關註疏，請參見附錄一，此處不一一臚列。）

唐・般剌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CBETA, T19, no. 945。

唐・智升，《續古今譯經圖紀》，CBETA, T55, no. 2152。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明・智旭，《閱藏知津》，CBETA, J32, no. B271。

明・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CBETA, X13, no. 287。

清・通理，《楞嚴經指掌疏懸示》，CBETA, X16, no. 307。

二、中文參考書目

于君方，〈「偽經」與觀音信仰〉，《中華佛學學報》，第 8 期，1995 年 7 月，頁 97-136。

王彥明，〈《楞嚴經疏解蒙鈔》的文獻學價值〉，《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 年第 1 期，頁 67-71。

王紅蕾，〈錢謙益《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考論〉，《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3 期，頁 69-76。

呂澂，〈楞嚴百偽〉，收入李安編，《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山東：齊魯書社，1996 年，頁 370-395。

李治華，〈《楞嚴經》與中國宗派〉，《中華佛學研究》，1998 年 3 月，頁 207-29。

周黃琴，〈《楞嚴經》的疏解——以陸西星的《楞嚴經說約》，《楞嚴經述旨》為例〉，《宗教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頁 97-1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群，〈晚明文士與《楞嚴經》〉，《江海學刊》，2013 年第 6 期，頁 178-187。

夏志前，〈《楞嚴》之諍與晚明佛教——以《楞嚴經》的詮釋為中心〉，《中國哲學史》，2007 年第 3 期，頁 26-33。

——，〈《楞嚴經》之譯解與聖典化問題〉，《學術研究》，2014 年第 11 期，頁 22-30。

連瑞枝，〈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中華佛學學報》，第 7 期，1994 年 7 月，頁 357。

梁銀林，〈蘇軾詩與《楞嚴經》〉，《社會科學研究》，2010 年第 1 期，2010 年，頁 187-191。

項潔、涂豐恩，〈導論——什麼是數位人文〉，收入項潔主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頁 9-28。

楊志常，〈晚明《成唯識論》註釋傳統的重新建構——數位量化人文的視角〉，《臺大佛學研究》，第 40 期，2020 年 12 月，頁 85-134。

楊維中，〈論《楞嚴經》的真偽之爭及其佛學思想〉，《宗教學研究》，2001 年第 1 期，頁 59-66。

韓鐘萬，〈《楞嚴經》在韓、中、日三國的流傳及歧見〉，《佛學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17-20。

龔雋，〈宋明楞嚴學與中國佛教的正統性——以華嚴、天臺《楞嚴經》疏為中心〉，《中國哲學史》，2008 年第 3 期，頁 33-47。

三、西文參考書目

Benn, James A. “Another Look at the Pseudo-*Śūraṃgama Sūt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 no. 1 (2008): 57-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Freschi, Elisa. "The Reuse of Texts in Indian Philosophy: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43, no. 2-3 (2015): 85-108.

Freschi, Elisa, and Cathy Cantwell. "Introduction: Reuse and Intertext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Text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33, no. 1-2 (2016): 1-7.

Freschi, Elisa, and Philipp A Maas. *Adaptive Reuse: Aspects of Creativity in South Asian Cultural Histor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7.

Smith, Wilfred Cantwell. *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8.

Smith, Temple and Waterman, Michael.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molecular subsequences." *J Mol Biol*. 147, no.1 (1981): 195-197.

Tokuno, Kyoko. "The Evaluation of Indigenous Scriptures in Chinese Buddhist 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s Glossary of Chinese Terms." In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edited by Robert E. Buswell Jr, 31-7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四、網路資源

CBETA 歷年各項作業成果統計表。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20 日。http://cbeta.org/result/statistic.ph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Exploratory Overl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Case Study in the Commentarial Tradition of *Lengyan Jing* in Song, Yuan, Ming Dynasty

Chih-Chang Yang, Jen-Jou Hung,
and Pang-Hsin Cho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macro overlook of the commentarial tradition of *Lengyan jing*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most influential indigenous scriptures in Chinese Buddhist tradition. The research scope is comprised mainly of two parts: 1) The group of the commentarial tradition of *Lengyan jing* in Song, Yuan, Ming Dynasty, which includes 39-volume/312-fascicle *Lengyan Jing* commentaries; 2) The possible quotation sources of the group, which includes 670-volume/5,277-fascicle scriptures in the Buddhist Canon.

Facing massive quantities of *Lengyan jing* commentaries and their related reference sources, in the past the researchers had to selectively focus their studies in limited quantities of *Lengyan jing* commentaries and their possible related reference sources. The limitation of such research methodology failed to capture the macro overlook of the commentarial tradition of *Lengyan jing*. Using the

* Yang, Chih-Chang,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ung, Jen-Jo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of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Chou, Pang-Hsin, Specialis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臺灣人文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of Digital Humanities–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extual reuse, this article aims for an exploratory overlook of the Commentarial Tradition of *Lengyan jing* which used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come by if not impossible.

Keywords: *Lengyan jing*, commentarial tradition, textual reuse, digital humaniti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